

· 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 著 ·

义和团运动 与近代中国社会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学刊〈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九·成都

1135027

· 责任编辑：吴金钟

封面设计：张复祥

义 和 团 运 动 与 近 代 中 国 社 会
YIHETUAN YUNDONG YU JINDAI ZHONGGUO SHEHUI

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1 字数：527千
1987年9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524-037-X/K·9

(书号：11316·79) 定价：3.95元

前 言

1986年5月6日至10日，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史学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了70多篇论文，并就当前提出的新问题和有争议的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充分显示了这是一次检阅近年来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成果、探讨新问题和开拓新领域的学术盛会。

为了全面反映这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促进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本会委托陈振江同志选编这本论文集，并承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慷慨相助，予以出版。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就大会收到的70多篇论文来看，清楚地反映了近年来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确有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较广泛地注重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多层次的探讨，而不是局限于论列这场运动的具体情节；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初步运用了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结构分析，以及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下层社会与群体意识等等。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开阔了研究的视野，扩大的研究的范围。

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心理，以及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清朝统治者的政策、重要人物的活动等方面，较深刻地论证了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并对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在具体分析和结论上，许多文章各有千秋，观点并非一致，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一批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的文章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的文章别开生面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对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与局限，解释了这场运动的特殊风貌和斗争形态；因为义和团时期的社会心理主要反映了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脉搏、愿望和认识水平。有的文章则从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来探索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局限及其失败的必然性。当然，这类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还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种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有不少篇文章还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组织基础。这虽属是探讨义和团源流的老问题，但这些文章却从更深的意义上论证了民间各种“自卫身家”的武术团体、秘密宗教和形形色色的团练怎样在民族矛盾激化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凝聚成了强大的民众运动；并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民风民俗和传统文化的特质等方面论证了义和团运动是多源合流的运动，因此形成了它的独特的风貌和特殊的斗争形态。读者可从这类的文章中清楚地了解广大松散、闭塞的乡村，愚昧、落后的下层民众是怎样在共同的民族传统和反侵略的群体意识的基础上迅速联合起来的。

有关反教会斗争与义和团运动关系的研究也有可喜的进展。有的论文深入分析了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轨迹，启发读者全面地把握这场运动的起因、规律和特点。有的文章对梨园教案作了全面、周密的论述，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有的研究者对义和团时期的南方反教运动这一很少人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详加论列，成为填补空白性质的长篇宏论。这类文章共同把教案与义和团运动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有关清朝统治者的政策、内部斗争和重要人物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在大会论文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他们通过不同侧面的分

析，对义和团运动速起速灭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冲击等社会历史现象都有独到的见解。

有关“东南互保”的评价是这次会议争论热烈的问题之一。多年来，几乎是众口一词，完全否定“东南互保”的积极意义。这次会议的一些文章仍坚持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而另一些文章则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认为“互保”有着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它在防范外国侵略者对长江流域的侵略与争夺，在维护江南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等方面都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对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理论及史实考订等方面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由于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仅就上述的简介来看，足以证明这次讨论会的文章内容确实是丰富多彩的，由于研究的中心议题大都是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因此我们选编这本文集也就以此为f中心，并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作为这本集子的名称。为使全书形成一个整体，共分七类进行编排：

- 一、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
- 二、义和团运动的组织基础；
- 三、教案与义和团运动；
- 四、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与“东南互保”；
- 五、义和团的思想及其他；
- 六、清方人物与武卫军的作用；
- 七、义和团史研究的趋向与史实辨析。

这种编选的方法不一定妥当，错误缺点一定不少，恳祈读者谅解和批评。

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

1986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	---

一、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	1
-------------------	---

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李文海 刘仰东	1
---------------------------	---

直鲁豫社会的结构变动与义和团运动.....程 洪	26
--------------------------	----

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破产与义和团运动...张 思	62
--------------------------	----

山东的铁路修筑与义和团运动.....马庚存	85
-----------------------	----

二、义和团运动的组织基础.....	97
-------------------	----

神拳与义和团.....程 啸	97
----------------	----

梅花拳与义和团运动.....冯士铎	131
-------------------	-----

团练与义和团运动.....王明伦	140
------------------	-----

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直、鲁民团.....周 源	158
-------------------------	-----

三、教案与义和团运动.....	181
-----------------	-----

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轨迹	
----------------	--

再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徐绪典	181
----------------------	-----

冠县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运动.....路 遥	194
-----------------------	-----

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反洋教斗争初探·····	贺弘景 (223)
山东士绅与反教会斗争·····	陶飞亚 (278)
义和团运动后的反教斗争浅析·····	刘鉴唐 (287)

四、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与“东南互保”····· (305)

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与义和团运动·····	陈振江 (305)
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	戚其章 (316)
庚子宣战与“假照会”关系考辨·····	林华国 (338)
“东南互保”再探讨·····	谢俊美 (354)
论“东南互保”·····	金家瑞 (368)
“东南互保”述论·····	刘天路 (383)
地主阶级的内部分歧与义和团运动·····	廖一中 (397)

五、义和团的思想及其他····· (403)

义和团思想论略·····	何若钧 (403)
义和团运动三题·····	苑书义 (411)
再论四川义和团运动	
兼及义和团运动的范畴·····	张 力 (421)
论甲午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的三	
种爱国自救运动·····	王守中 (438)
略论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李喜所 (449)
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	乔还田 (460)
义和团口号特点试论·····	郭墨兰 (468)
义和团的三层组织·····	陈贵宗 (480)
义和团运动中的地方士绅·····	张九渊 (492)
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源·····	史若民 (506)
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	王魁喜 (526)

六、清方人物与武卫军的作用…………… (539)

荣禄与义和团运动……………李文海 林敦奎 (539)

李秉衡与义和团的关系浅析……………张庆军 (575)

张之洞与义和团运动……………黎仁凯 (588)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袁世凯……………侯 杰 (604)

武卫军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马振举 (615)

七、义和团史研究的趋向与史实辨析…………… (631)

就新编档案史料谈对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几

点浅见……………朱金甫 程 啸 (631)

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孔祥吉 (639)

〔一、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

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

李文海 刘仰东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显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只有从各个不同侧面去观察，才能了解它的全貌。就义和团运动来说，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远不能说对这一侧面已经饱览无余，研究得十分透彻了。但是，当我们调换一个角度，尝试着从一个新的侧面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审视时，我们有理由期望它会呈现若干新的形象，使我们得到一点新的认识。我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确定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探索和剖析义和团运动的。

迷信思想与群体凝聚力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总要凭藉某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往往是多元的，也就是多种因素的集合。象义和团这样的政治集团，它的群体凝聚力主要是什么呢？

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和稍后一段时期，许多记载义和团的文字，都把迷信思想看作是义和团藉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情

感力量。所谓“上法焚表，闭枪炮，钝刀剑，妖言惑众，一人倡之，众人附和，举国若狂”^①，所谓“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而愚民趋之若鹜”^②，就都是认为义和团是靠迷信思想加以维系的。

但是，也有少数较能细心体察而又认真思索的事件目击者，不满足于这种肤浅的说法，认为迷信的力量毕竟是一种表面现象，更深的根源却并不在此。柳堂在《宰惠纪略》中曾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过这样一段话：“或曰，五六月间，不惟村农学之，间有读书人子弟，父兄亦不深禁；即不学，亦绝不以为非，而心向之者。何也？”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其心向之也亦犹是耳。”^③就是说，由于民族压迫的存在，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虽然对义和团的那些迷信举动“明知非正”，但因为它能满足人们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情绪。所以还是“不以为非”，反而心向往之。管鹤在《拳匪闻见录》中也说，“方今我国自知孱弱，而不求所以自强之方，第知仇人，而不求所以自立之道。愈不振，愈闭塞，愈羞愧，乃愈愤懣。一旦有以神术售者，恐将信而奉之，倩为御侮计。”^④如果排除作者因敌视义和团而形成的某些偏见，那末这段话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种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内容：人们所以对义和团的“神术”“信而奉之”，主要是因为愤懣于国家民族之“不振”，而又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自强之方”和“自立之道”。也就是说，义和团的迷信思想能够起作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二册，第434页。

②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页。

③ 《义和团》第一册，第403页。

④ 《义和团》第一册，第467页。

用，是要有一定的土壤的；这个土壤归根到底还是对于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民族压迫的反抗要求。

确实，从根本上说来，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最主要的还是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这在义和团的文书揭帖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在这些材料里，义和团公开宣称：“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祸乱中华”，“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提出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割据逞奇能”，并表示“最恨和约（指不平等条约），误国殃民”^①。就这一部分内容而言，义和团所作的对外国侵略的揭露和对民族危机的描述，比之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的呼喊，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不仅如此，义和团还进一步把抨击的矛头，无情地指向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投降卖国势力，指斥他们“割地赔款”、“羽翼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并且指名道姓地警告奕劻“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如此不改，悔之晚矣”。甚至揭露甲午战争时，正值慈禧“六十万寿”，“朝廷骄纵至甚”，“是时文嬉于内，武弛于外，以致用兵一败涂地”^②，这简直是直批龙鳞了。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激烈程度，是戊戌时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未能企及的。

但是，这些具有强烈政治色彩思想和言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毕竟只能为一小部分群众所掌握、所理解、所接受，对于大多数僻处在荒村野寨、劳作于田间山林的贫苦大众以及那些下层知识分子来说，认识要一下子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显然还有相

① 上引材料均见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不一一注明出处。

② 上引材料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当一大段距离。因此，大量的迷信内容，便有意无意地作为一种必要的添加剂，掺入到上述那些思想中去，以便借助“神”的力量，使之得到扩散，得到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迷信思想也应该看作是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之一种。

我们可以具体考察一下，义和团的迷信思想，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它导源于——甚至还可以说迎合于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把外国侵略者包括教会势力的罪恶，说成是亵渎了神灵，干犯了天怒。一份借用“玉皇大帝”名义书写的揭帖说：“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我极为震怒，大发雷霆。”另一张揭帖声称，外国洋人弄得中国“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

“因以外教邪术迷人，上天恼怒，差众圣下界，赴坛传教子弟”。还有的说，洋人的胡作非为，使“神发怒，佛发愤”；“神爷怒，仙爷烦”^①。中国有句老话，是常常用来作为表明罪大恶极的极限程度的，叫做“天怒人怨”。义和团抬出玉皇、上帝、仙、佛、天庭等等来，强调这些主宰世界的神灵都已经被“洋鬼子”的行径所激怒，这就一下子在人们的心理上大大加重了外国侵略者所犯罪恶的份量。不仅如此，义和团还在宣传中强调，当时北方中国广大地区所以久旱不雨，正是由于洋教惹恼了老天而降下的惩罚，“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因此，只有“扫除外国洋人，象（才）有细雨”，“不平不能下大雨”，“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②这样，就巧妙地把对洋人罪恶的揭露同广大群众特别

① 以上引文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② 以上引文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是农民的切身利益联系了起来。这种宣传方式在群众中显然是常见的。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谈到，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的群众就“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群众纷纷起来，“齐向洋人拼命”。不过王照认为以这种形式动员起来的群众斗争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路矿大利，交通大权，被德人夺去，土人毫不能解，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①。同样的道理，一旦天下大雨，旱象解除，又将怎样来解脱外国侵略者的滔天大罪呢？所以，英国公使 窦纳乐在1900年5月21日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不无根据地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②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建筑在迷信心理上的宣传的局限。

第二个方面，是把义和团的灭洋斗争说成是得到上苍的支持，是符合甚至代表天意的。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记载，义和团运动时期，各处流传着这样的话：“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③义和团揭帖、碑文、告白、传单中也充斥着这一类的内容：“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象之流”。“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否极泰来之兆也。”^④在封建时代的传统心理中，“逆天行事”还是“顺天应时”，往往被看作是衡

① 《义和团》第一册，第410页。

② 《义和团史料》下，第541页。

③ 《庚子记事》，第12页。

④ 以上引文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量事情的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义和团强调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是在执行天的意志，甚至是接受上天的派遣，显然是用迷信来加强自己活动和斗争的正义性和严肃性。综观各地义和团所打的旗号，可以发现，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名称，往往同两种内容相联系。一类是与神权相联系，如“义和神团”、“替天行道”、“天神天将”、“奉天承运”等等；另一类是与皇权相联系，如：“奉旨义和团”、“奉旨义民，保清灭洋”、“钦命乾字义和神拳”等等。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这表明，义和团虽然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了“国家不能敌，而民自敌之”的境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但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却总是需要寻找某种依托和支持——不是依托于现实生活中掌握统治权力的君主或封建政权，就是依托于幻想世界里主宰宇宙万物的上天和神权。这恰恰表明了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特性。^①

第三个方面，是用一些神秘的宗教预言或荒诞的宗教形式，在群众中造成一种紧张、惶恐和避祸趋福的心理，以提高义和团的声望和权威。义和团宣传品中，常常有“〔今年〕人死大半”、“人民有灾当为善”、“十方大难死七分”、“善者方免，恶人难逃”^②之类的内容。这种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同时也就在一部分群众中制造这样一种心理：只有参加或者信仰义和团，才能躲过这场空前的劫难。到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北京、天津的街头，义和团几乎每晚要传下坛谕。或者“令家家向东南叩头”；或者“令各家烧香点灯，帖红纸条，不准睡”；或者命“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或者“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一不许动烟火，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② 上引材料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

许茹葶，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如此等等。甚至有时荒唐地要求妇女不准梳头，不准洗脚，不准出门，不准下坑，让各家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①。这些奇特怪诞的行为，在实际上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今天看来也许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人们却是“不敢不遵”，居民们几乎是“无敢不从者”②。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些图景：“义和团民传知各户，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故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③“夜半，匪徒（按对义和团的污称）沿街狂呼，传播邪说，一夕数惊。”④“夜间则有人沿街传呼，或云：‘向东南烧香’；或云：‘供净水一盂’；或云：‘今夜勿睡，以防妖邪之入人家’；由初更至天明止，卯辰以后，则声息不闻矣。及昏，又复如是。”⑤义和团这样的令出必行，虽然不是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以迷信行为为主之，在当时的群众心中却也确实大大地增添了他们的声威。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费尔巴哈的如下一句话：“神的崇拜只不过依附在自我崇拜上面，只不过是自我崇拜的一个现象。”⑥

最后一方面，义和团用迷信的方式夸张自己的“神术”、“法力”，实际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在武装斗争中物质力量方面对敌人的劣势，力图“仗神威以寒夷胆”⑦，在精神上去压过外国

① 《庚子纪事》，第84、87、102、104页。《义和团》第二册，第11、147页。《义和团》第一册，第475页。

② 《义和团史料》上，第208页。《庚子纪事》，第104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页。

④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9页。

⑤ 《义和团》第三册，第473页。

⑥ 《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

⑦ 《义和团》第一册，第314页。

侵略者。义和团到处宣传他们“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中，掣云御风，进退自在”。又说：“教练神拳，精之能枪炮不入，藉以歼灭西人，共伸大义。”^①至于义和团能使敌人“枪炮不燃”、“可咒其火药自焚”，能“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红灯照能“驾一片彩云，直上天际”，“只须红巾一拂，可使百尺楼顶发火，立时灰烬”，用扇一煽，便能使洋人“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甚至说红灯照已把俄国、日本的京都烧毁，“外洋十八国已灭十六国”，等等的无稽之说，在当时确实是“一唱百和”，不胫而走^②。尽管有的人根本不信，有的人将信将疑。但也确实有不少群众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来对待它的，还有一些人则采取坚信不疑的态度。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迷信观念的制造者们，心里一定十分清楚：这些所谓的“神术”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末，他们出于什么心理要制造出这些神话来呢？这无稽之谈得以广泛传布，又是适应于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看来，唐晏在《庚子西行记事》中的一段话是比较接近实际的：“甲午之役，吾国败于日人，上下之人举以为忧。亦明知其宜发奋以自强，然自强之道，果安在乎？于是君子谋于朝，小人谋于野。”手无寸铁的群众“求其所以能制胜而杀敌者，其道无由。盖洋人之炮利也，必求所以不畏炮火者，兵精也，必求所以能制其兵者，至此而民之技穷，乃有为之说者曰：胜此者，非神道不为功。于是义和拳之说起矣”。^③就是说，当广大下层群众在民

①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48、58页。

② 《义和团》第一册，第13、346、470页。《义和团》第二册，第9、141页。《义和团》第三册，第374、486页。《义和团史料》上，第251页。《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6页。

③ 《义和团》第三册，第486页。